

丝绸之路上的佛教石窟

介永强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而来,丝绸之路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丝路佛教文化研究是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丝绸之路佛教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其中尤以石窟造像得天独厚。沿着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从天山南北到河西走廊,再到关陇地区,大大小小的石窟寺弥山跨谷,星罗棋布,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内涵丰富的丝绸之路文化。佛教石窟寺构成了丝绸之路的风景轮廓线,是丝绸之路上至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全面深入研究丝绸之路佛教石窟寺,对于当前促进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丝绸之路;佛教;石窟寺;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6-0105-03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了中国内地。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开辟了有利于中西交往的丝绸之路,从而为佛教传入中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而来,丝绸之路因而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佛教石窟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些石窟即以长安以西的丝绸之路沿线最为密集,它们的始凿与续建,事实上都与丝绸之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印度佛教通过丝绸之路最先传入了古代西域(今新疆地区),西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主要通衢,随之在此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石窟群。西域石窟主要以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和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分布在天山南麓。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石窟主要有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台台儿石窟、温巴什石窟、喀拉苏石窟、萨喀特喀石窟、阿克塔什石窟、玉开都维石窟、都干石窟和库车县库木吐拉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玛扎伯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阿艾石窟、苏巴什石窟以及新和县托乎拉克埃肯石窟。从地理条件看,龟兹北依天山,陡峭的沙岩崖壁使凿建石窟具有良好的地质基础,龟兹石窟大都开凿于天山的支脉确尔达格山上。龟兹境内又有发源于天山的木札提河,塔里木河等河流,现存龟兹石窟正是沿河岸崖壁而凿。以高昌为中心的西域石窟主要有柏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石窟、雅尔湖石窟和吐峪沟石窟等。高昌北依天山东部主峰博格达峰,南临库鲁克山,中间是绵延200多公里的火焰山。柏孜克里克石窟和胜金口石窟都开凿在火焰山的崖壁上。龟兹和高昌之所以凿有如此众多的石窟,主要是因为它们处于丝绸之路天山南路北道上。其中,龟兹石窟占西

域石窟的3/5左右,因为龟兹是丝绸之路天山南路北道上至为重要的一个交通中心。介于龟兹和高昌之间的焉耆(今新疆焉耆县),是西域石窟分布的次一级中心。历史上,焉耆是西域石窟分布较多的地区,可惜现存的只有七格星石窟。焉耆在历史上之所以成为西域石窟分布较多的地区,也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天山南路北道从此通过,因而这里很早就成为佛教圣地。

佛教从西域向内地传播,必经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丝绸之路上的河西石窟的创建晚于西域石窟,但其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先后建立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等几个政权,凉州(今甘肃武威)长期成为河西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其地佛法源远流长。凉州在晋末即为禅法最盛之地,开窟造像在河西地区因之如火如荼。唐人释道宣称凉州石窟“连崖绵亘,东西不测”。^①丝绸之路上的河西石窟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河西石窟西起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向东依次主要有五个庙石窟、榆林窟、东千佛洞、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金塔寺石窟、天梯山石窟等。就其分布情况看,大多在丝绸之路重镇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附近。敦煌地近玉门重关,位当丝绸之路总馆,莫高窟就在敦煌东南,敦煌西南则有西千佛洞。安西与敦煌毗邻,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而兴建有榆林窟和东千佛洞。酒泉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大漠,自古是戎羌通驿之途,文殊山石窟就建在酒泉城南。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是丝绸之路东段重要的都会,在其南面有马蹄寺石窟、金塔寺石窟、千佛洞石窟、观音洞石窟等。武威,史称姑臧,凉州,位于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东端,襟带西蕃,商旅往来,无有停绝,也是当时经

作者简介:介永强(1969~),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

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都会,天梯山石窟就坐落在武威东南。

丝绸之路陇西段有一条路线是由长安沿渭河西行过陇关,经天水、临洮、临夏、永靖,到临津关渡黄河,再经青海西宁的西北方向翻越祁连山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陇中炳灵寺石窟正处在这条交通要道上。炳灵寺石窟是陇中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此外,陇中石窟还有景泰五佛寺石窟、靖远法泉寺石窟和寺儿沟石窟等,景泰和靖远都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隘。

渭河上游沿岸的今甘肃省天水、甘谷、武山等陇南地区古属秦州,其地东接关中,南邻巴蜀,西控甘南,北扼陇坻,向为关陇之会的锁钥之地、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在这里也形成了一个石窟群。陇南石窟主要有天水麦积山石窟和武山水帘洞、拉梢寺、千佛洞、木梯寺石窟以及甘谷大像山石窟,其中,麦积山石窟开创历史最久,窟龕数目最多。天水自古以来就是陇东南人文荟萃之地,“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麦积之状,故有此称”。^②麦积山地势险峻,风光秀丽,成为历代佛教徒修习禅的理想之地,因而于其峭壁之间开窟造像,镌石成佛。

陇山以东的今甘肃省庆阳和平凉两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宁夏、内蒙以及河西的关隘。这一带是丝绸之路自长安出发,北往陇东高原,越过陇山,经宁夏固原、海原等地,到达甘肃靖远、景泰,渡过黄河,抵达武威而进入河西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陇东地区成为佛教石窟寺的繁盛之地。据不完全统计,陇东地区大、小石窟有20余处,规模较大的著名石窟寺有庆阳北石窟寺,泾川南石窟寺和王母宫石窟,泾川罗汉洞石窟和丈八寺石窟,镇原县石空寺石窟,华亭县石拱寺石窟,合水县保全寺石窟、张家沟门石窟和莲花寺石窟等,大多创建于北魏到唐代,主要分布在泾河两岸及陇山和子午岭中。泾州是屏藩西北的重镇,丝绸之路北线由长安出发,沿泾河西行,必须经过泾州。泾河两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两岸的红沙岩层则适宜雕刻,在这里形成了一条奇特的“百里石窟长廊”。考古工作者发现,在泾河两岸泾川段山壁上分布着512个石窟和5眼窟中石井,石窟依山脉走势错落分布,连绵百余里。这512个石窟中,既无塑像亦无壁画的禅窟、僧房窟有400多个,比敦煌北区同类窟多近一倍^③。

陇山北部以固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石窟群,主要有须弥山石窟、石空寺石窟、天都山石窟、无量山石窟、禅佛寺石窟等,皆属固原地区。固原地处黄河中游,自古以来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北魏时为高平郡治,北周时为原州治所,“当关陇之要”。^④汉唐丝绸之路北道经过固原,固原因而有“关中咽喉”之称。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以固原为中心的石窟群,其中须弥山石窟规模最大。须弥山是陇山

的支脉,海拔1800米,峰峦叠嶂,怪石嶙峋,又有石门水(寺口子河)从山前徐徐流过,曲径通幽。须弥山石窟就开凿在风景优美、环境幽静的须弥山东麓。

地处关中西北山区的彬县是丝绸之路西出长安必经的重镇。彬县大佛寺为唐代京右之大刹,造像时代延续较长,从北周到晚唐,造像将近1500尊,成为陕西境内规模最大的石刻造像群。地处关中西部的麟游县位于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南、北两道必经重镇——彬县与凤翔之间,又是皇家别苑隋仁寿宫、唐九成宫所在地,石窟摩崖龕像也十分丰富,主要有慈善寺石窟、石鼓峡石窟、东川寺摩崖、白家河摩崖、麟溪桥摩崖、喇嘛帽山摩崖等。

佛教徒之所以要开凿石窟塑佛画像,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对于佛教传布者来说,通过佛像或佛画,能够形象地宣传佛教教义,可以使“观者听,听者悟”,“进可以击心,退可以招劝”,比之艰涩难懂的佛经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第二,对于佛教信仰者来说,大花钱财开凿洞窟塑佛画像,他们希望得到百倍千倍的报答,不仅幻想自己升入无量的佛国,而且还企盼惠及子孙后代。第三,对于佛教修炼者来说,根据佛经中修行法的规定,修行不仅要观佛,还要礼佛或对佛作供养,这样的修行是离不开石窟的,特别是早期佛教更是如此。^⑤在印度,最早的佛教石窟是开凿于公元前3世纪的阿旃陀石窟。阿旃陀石窟是佛教石窟开山之作,其后,印度佛教徒相继开凿石窟百余处。印度佛教主要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随之最先形成了西域石窟群,进而东渐,在丝绸之路沿线形成了为数众多的石窟寺。这些石窟寺在地理分布上的一个共同点是,远离闹市,但不会过远,最远的距离也就五六十公里,而且依山傍水。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寺在地理环境上的这一共同点,与北方佛教重修禅的特点有关。

中国佛教“南重义学,北重实行”,“北土佛徒,特重禅定”。^⑥历史上,曾经驻锡丝绸之路地区的大德高僧鸠摩罗什、玄奘、慧远、法护、智严、道进、智猛、昙摩蜜多、惠觉、昙曜等人都是著名的禅师。夫坐禅者,宜山栖穴处,则凿窟以禅居,亦意中事。^⑦禅经中说,参禅须先观像,《坐禅三昧经》卷上云:“若初习行人,将至佛像所,或教令自往,谛观佛像相好。”《五门禅经要用法》云:“若行人有善心已来,未念佛三昧者,教令一心观佛。”因为观像就如同见佛。《思维略要法·观佛三昧法》云:“人之自信无过于眼,当观好像便为真佛。”释迦牟尼即曾跏趺坐观像,因而得道成佛。《法苑珠林·敬佛篇·观佛部》引《迦叶经》云:“有一菩萨,名大精进……有一比丘于白毡上画佛形像,持与精进,精进见像,心大欢喜……既得出家,持像入山,取草为坐,在画像前,结跏趺坐,一心谛观此画像,不异如来……佛造迦叶,昔大精进,今我身是,由此观像,今得成佛。若有人能学此观,未来必当成无上道。”可见,观像是修禅的一

个必经步骤。^⑧

禅经说观像的场所是石窟,因为习禅所见的多种化佛形象,多在石窟中。《观佛三昧海经》卷3《观相品》云:“是时世尊欲令大众见佛色身……佛即化精舍如白玉山,高妙大山犹如须弥。百千龕窟,于诸龕窟影现诸像与佛无异。”同书卷7《观四威仪品之余》云:“尔时如来敕诸比丘皆在窟外,惟佛独入自敷坐具。敷坐具时,令此石山誓为七宝。”又云:“观佛影者,先观佛像,作丈六想,结跏趺坐,敷草为坐,请像令坐。见坐了了,复当作想作一石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清白石想。此想成已,见坐佛像住虚空中,足下雨花。复见行像入石窟中。入已,复令石窟作七宝山想。”禅经还说,禅僧应在石窟中坐禅。《付法藏因缘传》卷2云:“山岩空谷间,坐禅而寔定。风寒诸勤苦,悉能忍受之。”

禅经不仅说修禅的场所是石窟,还明确指出修禅宜山栖穴处,习禅要有安静的环境。《坐禅三昧经》卷上云:“闲静修寂志,结跏坐林间。”《禅秘要法经》卷中云:“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阿练若处。”同书卷下云:“佛告阿难,佛灭度后,佛四部众弟子,若修禅定,求解脱者……当于静处,若冢间,若林树下,若阿练若处,修行甚深,诸圣贤道。”《观佛三昧海经》和《付法藏因缘传》对在山间修禅的环境描述得更为具体。《观佛三昧海经》卷7《观四威仪品之余》云:“摩诃迦叶,徒众五百,化作琉璃山。山上有流泉浴池,七室行树。树下皆有金床银光,光化为窟。摩诃迦叶,坐此窟中,常坐卧,教诸弟子,行十二头陀。”《付法藏因缘传》卷1云:“于是迦叶即辞如来,往耆闍崛山宾钵罗窟。其山多有流泉浴池,树林蓊郁,百兽游集,吉鸟翔鸣,金银琉璃罗布其地。迦叶在斯,经行禅思,宣畅妙法,度诸众生。”

丝绸之路沿线佛教石窟寺在地理环境方面与上述情况并无二致。武周圣历元年(688)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龕碑》云:“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尊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⑨乐僔、法良

开凿的洞窟很难寻踪,但是莫高窟为禅僧始凿,了无疑义。莫高窟位于敦煌东南25公里处,在中西交通重镇敦煌,又远离闹市敦煌城,开凿于鸣沙山麓,古宕泉(今名大泉)的泉水从山前蜿蜒流过,形成一块小小的绿洲。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⑩的茫茫戈壁沙漠中,这里别有天地,自是凿窟禅居的好去处。《高僧传·玄奘传》云:“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从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弹道。”玄奘(402~444)是丝绸之路上的著名的禅法宗师,可见,天水麦积山石窟与禅僧有关。麦积山乃陇右名山,“为秦地林接泉之冠”。永靖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雄伟壮丽的小积石山中。小积石山千峰竞秀,万壑争奇。炳灵寺石窟前临大寺沟,这里有一条溪水从大寺沟流出,石窟就开凿在大寺沟右侧的悬崖上面。拜城克孜尔石窟位于干河谷的北岸。库车库木吐喇石窟的绝大多数洞窟集中在确尔达格山山口以内西北方向渭干河下游河谷的东岸。敦煌西千佛洞和五个庙石窟前临党河。安西榆林窟前临踏实河。张掖马蹄寺石窟位于马蹄河两岸,金塔寺石窟前有大都麻河流过。庆阳北石窟寺旁有蒲河,泾川南石窟寺前临泾水。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寺远离闹市,居于山区,加之旁有山泉或河流,使石窟寺更添了几分幽静和秀丽。石窟寺大都位于当时比较重要的交通道路沿线,尤其是和丝绸之路密切相关,因为这样更便于佛教徒的佛事活动。

总而言之,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寺弥山跨谷,星罗棋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宏大。中国有四大石窟,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就占其一半。从创建时代看,早在东汉末年,丝绸之路沿线就有石窟开凿。此后,历经十六国北朝如火如荼地开窟造像,乃至隋、唐、五代久盛不衰,直到宋、西夏、金、元、明各朝,连续续建。丝绸之路沿线开窟造像时间之早、经历朝代之多、绵延时间之长、分布地域之广,世所罕见。佛教石窟寺是丝绸之路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绚丽多姿、溢光流彩的佛教石窟造像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内涵丰富的丝绸之路文化。

[注 释]

①《大正藏》卷52,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②《太平广记》卷397引《玉堂闲话》。

③《甘肃泾河两岸惊现百里石窟长廊》,《光明日报》,2002年7月16日。

④《周书》卷25《李贤传》。

⑤ 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8页。

⑥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第552页。

⑦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9页。

⑧ 本文关于石窟与禅的论述,参见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⑨ 碑出莫高窟第332窟,转引自《武周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合校,参见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9页。

⑩ 法显著,章巽校注:《法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